

文体新变的内部机制和时代精神

——从“散文小说化”谈起

○ 袁晓薇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文体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带来了文体的新变。文体互动基于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和文体自身发展成熟所具备的能力。文体新变一方面来自于形式上的相互借鉴,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艺术趣味和文化精神的影响。“散文小说化”并非仅仅是散文创作中吸收借鉴了小说的一些手法,而是整个创作精神更加倾向于叙事性、描述性、传奇性等,体现出文学消费的娱乐化特点,是“文学图像化”在散文创作中的一种反映。此外,网络时代的“全民化”也是当代文学创作文体跨界现象大量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散文小说化;文体互动;文体观念;时代精神;文学图像化

“破体为文”,古已有之。钱钟书先生曾说:“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因此恢弘焉。”^[1]文体之间的交融渗透是文学史的常见现象,也往往为文体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成为文体演进的重要动因。“散文小说化”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散文小说化”和容易与之相混的“小说散文化”现象,体现了散文与小说之间的文体融合和渗透。对其的理解和评价,也带来了包括对于散文文体本质特征以及时代审美趣味等的一系列思考。本文从文体观念和时代精神的层面,对文体新变和文学演进的复杂规律进行探讨,以期对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散文小说化”等现象有所促进。

相较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一文体的情况最为复杂,散文创作样式千差

作者简介:袁晓薇(1974—),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合肥师范学院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语文教育研究。

万别,研究者关于散文界定的众说纷纭,使散文呈现出一派丰富而又复杂的景象。著名学者孙绍振在回顾当代散文三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时,认为当代散文创作和理论探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散文文体的真正自觉,从 50 年代对特写类新闻文体的依附,到杨朔开创的“诗化散文”模式,再到“真情实感论”,散文曾经几乎为通讯报告所取代,或被诗歌同化,体现出散文意识的薄弱,陷入了“文体危机”。^[2]这一论断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当代散文发展所面临的一些困境。然而,孙绍振先生文中并没有关注到现当代散文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散文小说化”,而这一现象与散文的文体自觉和创作特征密切相关。

现当代散文创作中的“散文小说化”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源于作者和读者对同一作品文体属性判断上的分歧,即:对于同一篇作品,作者、编辑以及普通读者具有不同的文体归类,以至于出现了一些难以分辨是小说还是散文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呐喊》一直被视为短篇小说集。然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这些作品称为“小说模样的文章”。美国学者李欧梵也认为:“《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读来像散文而不像小说,当然最后一篇《社戏》作为抒情散文是绝妙的。”^[3]郁达夫把他的著名散文《还乡记》编入小说集《茑萝集》(上海:泰东书局,1923年)。丰子恺的《法味》在《一般》(1926年10月号)杂志上发表的时候也被编辑归类为小说。新时期以来,很多名家作品集都是散文与小说的合集,如孙犁在新时期出版的多部散文集,均由小说、散文、杂文、读书笔记、题跋、书简几部分组成,其中,被他题作“小说”的诸多篇什,也常被看作“纪实散文”。史铁生《我与地坛》的发表,也由于在文体归属上的分歧而一波三折。据其编辑讲述,当时《上海文学》编辑部想作为小说发,史铁生却坚持说是散文,不同意作为小说发表。最终,编辑部做了变通:《我与地坛》既没放在小说栏目,也没散文栏目里,而是以“史铁生近作”为栏目标题发表了。其后,《我与地坛》被多家选刊转载,既有归入散文范畴,也有作为小说转载的。^[4]有意味的是,《我与地坛》获得了“1992年度上海文学小说奖”,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将其作为散文来看,只是这篇散文具有“小说嫌疑”。^[5]贾平凹的《商州三录》(包括《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出版社一般是作为散文集出版的,如《商州初录》收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贾平凹散文典藏大系》。但是,论者中既有将之作为“系列散文”^[6]来评论,也有当作“中短篇小说集”^[7]来研究。按说,作者最有发言权,然而贾平凹自己对此也难作区分,曾说:“这一二年来,我分不来我写的小东西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8]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散文”作家张锐锋的代表作《马车的影子》寄给某编辑后,得到的回复是:“您的大作看过了,不太像小说,所以退还给你。”^[9]王蒙的《明年我将衰老》入选《小说选刊》,王蒙自己也认为这是一篇小说,但是,有读者却觉得“这是一篇太像散文的小说,或者说是一篇被当成小说的散文。”^[10]这一复杂的阅读感受很有代表性:对于20世纪以来的很多名篇,按照散文或者小说的一般阅读习惯来读,都觉得不太符合,给人的感觉是介于“小说化”的散文和“散文化”的小

说之间。

“散文小说化”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还来自于作家的创作追求。沈从文是较早致力于在散文与小说之间融合的作家，他曾自述写《湘行散记》时就有“用屠格涅夫写《猎人笔记》的方法，糅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为一”的企图，并且认为：“这么写无疑将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一格，且在这格式中还可望有些珠玉发现。”^[11]其多篇代表作都鲜明地体现出进行散文和小说相结合的努力。1999年2月5日，莫言在北京签名售书时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坦言自己是把散文当小说来写，把散文随笔集《会唱歌的墙》称为小说集也未尝不可。^[12]作家龚全洪也说：“我写散文时，试着把它当作小说来写……”。^[13]近年来涌现出的“新散文”作家们更是纷纷致力于突破文体界限的“跨文体写作”。

“散文小说化”之所以值得关注，还在于其所引发的关于散文文体特质的争论和探讨。一直以来，研究者普遍意识到，与散文创作繁荣相应的是散文理论的薄弱。自“五四”以来，关于散文的文体界定、创作特征等的探究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形成共识。往往是散文作家根据自己对散文的理解和把握，写出自己认为是散文的作品；理论研究者却又喜爱根据某种理论，对散文作出种种界说和划分。上述一系列事件在散文作品文体判断上出现的诸多分歧，几乎已经“构成了对散文文体界定的一个反讽。”^[14]“散文小说化”常与“小说散文化”相混，不仅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经常分不清究竟是“小说化”的散文，还是“散文化”的小说，学界对于“散文小说化”和“小说散文化”的界定标准，也往往是“语焉不详”。^[15]很多作品就游移于“小说化的散文”和“散文化的小说”之间。诸多具有“小说嫌疑”的“疑似散文”，或者情况相反的“疑似小说”，颇令研究者困扰。有感于《我与地坛》的文体分歧，学者王彬彬发出如下感慨：

因为《我与地坛》当初是作为散文发表的，所以现在成了当代散文名作。研究当代散文的人不能忽略它的存在，而研究当代小说的人则不便将其纳入视野。然而，要是当初史铁生不坚持“这一定是散文”而任其以小说的名义问世，那情形就反过来了：研究小说者会用种种或新或旧的小说理论对其大加谈论，而研究散文者则认为它不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围。这样说来，一篇作品被当作“散文”还是被当作“小说”，有时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捉弄”。^[16]

这番感慨颇值得人们反思——当读者将一篇作品视为散文时，会从中找出它“小说化”的种种特征，而将之当作小说来看时，则会从中发现诸多的“散文化”特点，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判断实在令人有被“捉弄”的尴尬。在这纷扰繁杂之中，是否就没有一个分辨判定的标准？对于创作和评论中出现的游移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现象，仅仅以古已有之的“文体越界”、“文体合流”或者“跨文体写作”等概念化、简单化解释，总无法摆脱似是而非的困扰。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解释，认清其价值和意义。

二

日渐兴盛的“散文小说化”在带来太多疑问的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新鲜而富有意味的研究领域:不同文体之间相互借鉴和转化的表现、原因及其价值。文体之间的交融,首先而且基于彼此之间具有可以沟通的属性。“散文小说化”在现当代散文创作中的大量出现,不仅渊源有自,而且有其必然性。中国古代散文早在形成时期,就与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小说这一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一直受到包括散文在内的众多文体的影响,以至于有“文备众体”之说。古代神话和史传文学以及先秦诸子散文为后代小说提供了多方面的创作借鉴,已经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散文小说化”的形成和日渐盛行,首先基于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目前关于“散文小说化”的认识,主要是散文创作中的对于小说表现手法的借鉴,如塑造人物形象、完整的情节、生动细致的细节描写等。由此,对于散文文体特征的讨论也集中在“真实性”和“虚构”、“抒情”和“叙事”两大方面。但是,即便有了这一划分标准,对于“小说化”的散文与“散文化”的小说,辨识起来依然费力。这是因为,散文之中本身就蕴含了小说的因素,小说之中,也具有散文的某些特征。仅靠“真实性”、“虚构性”、“叙事性”、“抒情性”等特征不足以将二者截然区别开。

首先,散文并不排斥虚构。中国古代史书采用很多神话传说,也是一种非现实的想象与虚构。钱钟书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17]可见,即便是强调实录的史书,“也有一个自觉的虚构的传统,虽然这种虚构是有限度的。”^[18]至于《庄子》等寓言故事中的想象和虚构,更是小说的直接源头之一。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艺术想象和虚构使散文之中必然具有“虚构性”因素。唐人常常用“史”来评价小说,很多时候不一定指讲求真实,而是“叙事的生动性”。^[19]而小说创作也有真实性的追求。小说绘声绘色地描绘场景、刻画细节,也是为了营造一种“真实感”,显示其真实性,现代还产生了“纪实小说”这一类型。随着对散文创作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真实性与否不能作为散文小说划分的标准,有人就以“谁可以鉴定朱自清散文《背影》的真实性?”^[20]来质疑曾经被视作散文“生命”的“真实性”原则。

同样,“抒情性”和“叙事性”也不足以严格区分散文与小说。从中国文学传统来看,小说受到以抒情为特征的诗赋影响颇深。作为文学艺术的小说自然也需要以情动人。而散文也有叙事的功能和任务,尤其是“自叙传式”的小说,很接近于叙事散文甚至抒情散文。董乃斌先生明确指出:小说的文体孕育于叙事性散文。唐传奇的发达同唐代文坛散文领域的叙事化(小说化)倾向关系十分密切。^[21]只是,散文中的叙事与诗歌中的叙事近似,反映的不是客观经过,而是事情引发的情感反应与评价。由于缺乏对抒情和叙事方式的具体区分,许多编

辑和读者多将情节淡化,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小说划归到散文的范畴里;将散文误认为是小说,也是着眼于散文中出现较多的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描写、细节刻画等叙事性元素。因此,散文与小说之间混淆难辨的情况,多出现在叙事性散文与第一人称的小说之间。先师余恕诚先生在其早年力著《唐诗风貌》(初版于1998年)中,就对于诗歌中的叙事成分和功能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区分,将“藉叙事以抒情的长诗”命名为“叙情长篇”,区别于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生动人物形象塑造的叙事诗。^[22]明确了诗歌中的“叙情长篇”和“叙事诗”之异,有助于将叙事性散文与自叙传式小说区别开来。

在文体互动中一直存在着“异体交融”与“维护本色”之间的矛盾。“散文小说化”这类“文体跨界”现象是否会造成文体特质的丧失,是论者颇为关注的问题。随着“散文小说化”创作潮流的兴起,打破散文与小说的文体界限与维护散文文体特质的呼声一直并存。支持者认为这是突破文体的固有界限,带来了文体创新,促进了散文的繁荣。如散文家周佩红说:“既然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都可以而且已经向散文伸出了一只脚,散文为何不可以同样借用小说的情节化、诗歌的抒情化意象化、报告文学的纪实化,同时借鉴它们在文学创新思维方面已经到达的深度,来一个革新呢?”^[23]质疑者则担心过于“走向小说化”会导致散文文体的消解。评论界一直不乏“净化散文”的呼吁,老作家林斤澜就曾指出:所谓“小说化”的散文,其实就已经成为小说而不是散文了。^[24]这一担忧自然不无道理,但是,一味坚守疆域,画地为牢,同样会限制文体发展。余恕诚先生在与吴怀东先生合著的《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中,通过以唐诗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文体互动研究,得出一个重要发现:“文体的某些功能,也许是潜在的,在自身范围内找,或许视而不见,而当它在寻求发展的焦虑中,把目光投向他体时,却可能发现自身原可以有此种表现能力。寻找和发现他者,恰是从另一途径或另一种角度发现自我。”^[25]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创作中向他体借鉴,寻找发展出路,是自我完善的需要,逸出文体常格,并不是破坏文体的常态格局。唐代韩愈、柳宗元的“以文为戏”,为古文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但并没有改变古文本身的写作传统。“散文小说化”的兴盛,与大批小说家投身散文创作有密切关系。小说家们在散文创作中,自然将其叙事才能充分发挥在散文一体上,因而将散文本身蕴含的叙事性功能予以强化。因此,“散文小说化”只是就其表现从阅读感受上的一种形象说法,“借鉴小说的表现手法”并不是对于这一现象的唯一合理解释。散文通过与小说的交融,“发现自我”在叙事方面的功能,使之由隐而显,也是形成“散文小说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发现不仅对于深入解释、合理评价“散文小说化”现象很有帮助,也为文体互动研究展示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文体间的融合并不是各种文体的简单混同,而是彼此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互生的过程并不一定导致文体观念的淡化,而是能够促使各自的特征得到有力的彰显。

三

由上可见,散文与小说之间的沟通,本质上是艺术形式之间的沟通,包括语言形式上的自由无拘以及共同具有的叙事性功能。“小说化”的散文和“散文化”的小说,是散文与小说之间彼此靠近,以至于出现交叉的特殊地带,对于这种“临界状态”,^[26]仅凭一些艺术表现手法如“真实性”与否,或者以“抒情”、“叙事”成分来加以区分辨识,的确很难精准把握。实际上,散文与小说之间的“文体之感”,自古有之,中唐古文运动的两位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的创作中,往往有散文与小说之间相互“交涉”^[27]的情况。时至今日,众多学者在究竟是“用小说笔法写古文”,还是“用古文形式写小说”之间依然难以确定。^[28]对于韩愈《毛颖传》、柳宗元《捕蛇者说》等名篇的文体归属也是一直存在争议。^[29]

对文体演进规律的深入探讨,首先需要对文体的全面认识:“文体应该是一个立体的综合性甚至开放性的系统,大致表现为三个层面:其一,外在形式因素,如体裁、语体;其二,与体裁相适应的一套创作经验与表达技巧等;其三,内容因素,如题材、艺术趣味以及文化精神。”^[30]目前,对于“散文小说化”的认识,多从前两个层面着眼,对于第三个层面较少涉及,而这方面对于区分“小说化”的散文与“散文化”的小说有着重要作用。

比较一下对“散文小说化”和“小说散文化”的研究,不难发现,小说中的“散文化”倾向,多与“诗化”意蕴结合在一起,^[31]散文化的小说也常常被视作“诗化小说”。^[32]论者谈及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散文化”小说,多以浓郁的“诗意”和“意境的营造”为其审美特征。小说创作中的“散文化”多表现为“小说家们通过生活的片断”“诗性地表现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33]而散文中的“小说化”,则主要与增加可读性,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以“情节的戏剧性表现”,“增添了文本的趣味性和可读性。”^[34]“切合了众多读者的胃口。”^[35]“更能满足多元化消费的需要。”^[36]

从文坛现状来看,同样是“文体越界”,“散文小说化”与“小说散文化”的境遇却不相同:“小说的散文化”一直处于“边缘化”的非主流地位;^[37]“散文的小说化”却与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相伴:杨朔和余秋雨作为当代散文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的“范式化”或者“模式化”的代表人物,在散文中都具有鲜明的小说化叙事形态。^[38]加之贾平凹、王蒙等众多著名小说作家的加入,“小说化”散文日渐兴盛,具有蓬勃发展的势头。

通过以上对照,“散文小说化”与“小说散文化”之间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分野:“小说的散文化”,近乎“诗化”;“散文的小说化”,则近乎“通俗化”。前者走上了艺术化的道路,后者走的是娱乐化的大众路线,分明是两种创作取向。一直容易被混淆的两种创作现象,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如果说,五四时期出现的“散文小说化”,主要是文体观念的现代化使然。^[39]那么,当代散文创作中广泛出现的小说化倾向,除了是对散文文体曾经陷入的“诗化”模式、“真情实感”论和

“形散神不散”等理论创作局限的有意突破之外,显然与这个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有关。追求娱乐性是散文向小说进行借鉴的一个重要动因,这一点,在古代散文“以文为戏”的创作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40]在“图像时代”和数字媒体环境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且几乎成为时代文化主导力量,当今社会已经呈现“泛娱乐化”的倾向。在“快餐化”的浅阅读盛行的背景下,“故事情节”显然比“抒写性灵”更贴近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因此,叙事性文学成为当代文坛不容置疑的主流。当代小说的创作理念进一步明确了“故事性”的核心地位,以吸引读者为根本创作目的。2010年5月,在首届中国小说节当代小说高峰论坛上,众多小说界名家都认为小说最重要的是“故事性”。著名华人作家严歌苓指出:“光用语言写小说抓不住读者,小说应该具有故事性,小说家最基本的责任是讲好故事,好的小说要有能让读者一口气读完的魅力。”^[41]

另一方面,受到图像文化的影响,文学创作也趋向视觉化、感官化、平面化,走向了“文学图像化”。文学的图像化被认为是“视觉时代文学的核心特征”。^[42]“图像文化的感官美学、平面美学、仿真美学对文学形成了潜在的浸润与渗透,从而使文学的审美趣味、精神气质发生悄然移位,文学的世俗化、大众化倾向日益明显。”^[43]“文学图像化”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征:“文学作品的图像化包装、文学作品的影视化转换、文学作品语言的图像化趋向”。^[44]其中,“文学作品语言的图像化趋向”是文学创作中的图像化追求,也是“文学图像化”最为本质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虽然文学创作仍呈现为语言文字形态,但是语言高度直观感性化,追求的不是文学的审美意义和精神超越,而是感官欲望的铺陈、虚拟幻象的营造。文字中充斥着身体、场面和景观的描写,而少有对意义、价值、思考、心理等的表现。出现了“影视小说”、“视听小说”,乃至“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现象。如果说,文学的“图像化”是文学在“图像时代”的自变求新之举,那么,散文的“小说化”也是散文增加竞争力的必然走向。在现在这样一个小说和影视的时代,散文要争取读者,就必须增加其“可读性”,主要是加强故事性、传奇性、趣味性。因此,寻幽访胜、奇观幻境、历史钩沉乃至索隐探佚等传奇性题材均成为热门。同时,在写作中追求“可视性”,以逼真的细节描写呈现出一种作用于感官的画面感和“现场感”。为此,更需要吸收小说,乃至影视的表现手法。以此观之,“散文小说化”现象的兴盛,实际上是散文在历经“诗化”的抒情审美表达和“真情实感”等精英化模式后,走向了以“娱乐”代替“审美”或“审智”的通俗化道路,这是文体自身适应时代需求的一种变革努力。这种艺术趣味上的不同趋向,是小说和散文之间更为本质的区别,有助于更准确地区分“散文化”的小说和“小说化”的散文。

此外,网络时代的“全民写作”风潮,也是“散文小说化”等文体跨界现象大量产生的原因。著名学者南帆指出:“散文的文体旨在颠覆文类权威,逸出规则管辖,拆除种种模式,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散’的处理乃是这一文体的关键。‘散’意味着敞开防线和混合多种成分。散文应当竭力回避陷入某

种单纯的模式。”^[45]以自由表达、开放性为特征的散文,似乎“无门槛”,“把散文消减到谁都可以写散文的角度”,^[46]显然吸引了更广泛的作者参与,散文创作中的大众审美趣味也就愈加突出。加之编辑在认定散文和小说时,主要是根据自己对散文文体的理解,因而,大量“疑似散文的散文,或者说违背散文本质的伪散文”^[47]进入了散文的领地。然而,散文文体的包容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得散文创作特别需要个性化的抒写,无法为任何一种写作模式固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散文就是散漫无边的大杂烩。散文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融合在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之中,通过袒露独特自我的“性灵”,写出“自我生命体验”^[48]的细腻与深邃。因此,“不是不存在现代散文体式规范,而是现代散文体式规范更依赖于内在意识的外化。”^[49]这是散文明显不同于小说、戏剧及诗歌的文体特质。而当代文化中的大众化、娱乐化追求,则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散文的这一本质特征。这种为了标新立异,吸引读者而过度越界,甚至无限扩张的做法,只会沦为挂羊头卖狗肉的“伪散文”,致使散文面目不清,遑论繁荣。因此,“散文小说化”能否成为推动当代散文健康而富有活力的积极力量,既需要作家在理论上的自觉探讨,又要有实践中的自我把握。

20世纪以来,文体问题一直是需要加强的研究领域。相对于文学本体研究,文体之间的互动研究所具有的通识眼光更有助于跳出文学和文体本身的局限,而在文体形式特征之外,结合时代文化和审美趣味对于文体进行综合考察,则能够对一些矛盾复杂的现象予以科学合理的解释,这是“散文小说化”带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注释:

- [1] 钱钟书:《管锥篇》全汉文卷一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7页。
- [2] 孙绍振:《从文体的失落到回归和超越——当代散文三十年》,《名作欣赏》2008年第12期。
- [3]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 [4] 姚育明:《回顾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文学会馆网,2009年1月8日,<http://lit.eastday.com/renda/node5661/node5663/node5676/userobject1ai1572715.html>。
- [5] [16] 王彬彬:《〈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中国作家网,2007年1月9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56/2007/0109/1491.html>。
- [6] 李竹:《多姿多彩的商州风情画——评贾平凹的系列散文〈商州三录〉》,《宜宾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 [7] 曾利君:《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在褒贬中成长》,《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 [8] 贾平凹:《答〈文学家〉编辑部问》,《贾平凹文集·求缺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第325页。
- [9] [14] [35] 刘军:《新散文文体探索议》,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3、14、4页,http://61.132.134.90:8000/rewriter/CNKI_OLD。
- [10] 王文革:《是小说,还是散文?——谈王蒙小说〈明年我将衰老〉的“跨界写作”》,《中国艺术报》2013年4月8日第3版。
- [11] 沈从文:《新废邮存底》,《沈从文文集》(第12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 [12] 徐林正:《莫言:我把散文当小说来写》,《羊城晚报》1999年2月9日,<http://news.sina.com.cn/>

richtalk/news/culture/9902/020910.html。

[13] 龚全洪:《把散文当小说来写》,《内蒙古日报》2014年7月12日第13版。

[15][41] 徐丹玲:《论“小说化”散文与“散文化”小说的界定标准》,《毕节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7]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3页。

[18][19][25][26][30] 余恕诚、吴怀东:《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8、218、217、345、177页。

[20] 周晓枫:《谁可以鉴定朱自清散文〈背影〉的真实性》,《“2010中国文学高端论坛·散文创作学术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登》,人民网,2010年9月30日,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3/40474/12867604.html。

[21] 董乃斌:《唐代诗歌散文的小说化倾向——小说文体孕育过程论之一》,《唐代文学研究》(第四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3页。

[22] 余恕诚:《唐诗风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2页。

[23] 周佩红:《题中应有之义》,《散文百家》1992年第8期。

[24] 林斤澜:《小说的散文化和散文的小说化》,《文学自由谈》1992年8月28日。

[27] 康韵梅:《唐代古文与小说的交涉》,《台大文史哲学报》第六十八期,2008年5月。

[28] 蒋凡:《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小说”观》,《学术月刊》1993年第12期。

[29] 陈松柏:《论纪实性小说〈捕蛇者说〉》,《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1] 闫秋红:《“越轨的笔致”:小说的另一种诗化、散文化追求》,《江汉论坛》2003年第5期。

[32] 蒋小兰:《散文化小说审美特征论》,《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3]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34] 吴敏:《新以散文创作论》,广西师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50页,http://61.132.134.90:8000/rewriter/CNKI_OLD。

[36] 李子杨:《孙犁散文的小说化特征微探》,《文学界》2012年第5期。

[37] 佃国春:《论当代散文化小说》,华南师大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5页,http://61.132.134.90:8000/rewriter/CNKI_OLD。

[38] 刘晓鑫、汪剑豪:《朔初诗化散文的内核:小说化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宋力:《〈文化苦旅〉评识》,《广西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

[39]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97页。

[40] 袁晓薇:《柳宗元对“以文为戏”的贡献——兼论“以文为戏”的文体创新意义》,《东方丛刊》2006年第1期。

[42] 柴东东:《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图像化生产》,湖北师院硕士论文,2013年,第4页。

[43] 赵晓芳:《视觉文化冲击与浸润下的文学图景·摘要》,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页。

[44] 张经武:《当下文学的图像化追求》,《东方丛刊》2008年第1期。

[45] 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87页。

[46] 王彬:《现在散文的数量很多好文章少经典更少》,《“2010中国文学高端论坛·散文创作学术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登》,人民网,2010年9月30日,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3/40474/12867604.html。

[47] 王彬:《散文的本质与文体异化》,中国作家网,2013年8月14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08-14/170827.html。

[48] 张虹虹:《花季来临——新散文新现象概观》,《渤海学刊》1994年第4期。

[49] 魏继洲:《现代散文体式的建构与解析——散文写作行为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黎虹]